



“坚决革命的同志”——董振堂



董振堂。

一心向往光明

董振堂，1895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1926年9月，任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其部第五路军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

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经过历时三个月的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连续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队以重大打击，由于受到红军反“围剿”胜利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12月1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参谋长、中共秘密党员赵博生和重要将领李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等以及中共秘密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并开赴中央苏区，受到中革军委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和苏区军民的热情接待，并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

勇担铁流后卫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根据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五军团担任长征的后卫任务。红五军团1.2万余人在董振堂指挥下，一次次冲破敌人的重重围堵和步步追击，出色完成阻击国民党军队的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赫赫战功，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湘江战役中，董振堂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动员将士要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精神，战胜强敌，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被隔断在湘江东岸，几乎全军尽没。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趁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绞断肠子后壮烈牺牲，年仅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湘江战役，红五军团英勇后卫，浴血奋战数昼夜，阻击了十几倍于己的追敌，掩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安全渡过湘江。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付出了空前惨痛的代价，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红五军团由1万余人锐减到不足5000人。

1935年1月，先头部队攻下了遵义城，红五军

董振堂，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从宁都起义，奔向光明，到长征路上，勇担后卫，直至浴血河西、壮烈牺牲。在驰骋疆场、骁勇善战的戎马生涯中立下赫赫战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浴血河西走廊

1936年10月下旬，为打通苏联援助的道路，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先头部队在靖远河口（今虎豹口）渡河。此后，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及总部直属部队渡过黄河，共计21800余人。11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组成西路军。其中，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全军共四个团3000余人，枪1000多支。

进入河西走廊后，西路军相继攻克占永昌、山丹、临泽。1937年1月1日，红五军攻克高台，俘虏国民党高台县县长马鹤年、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王兆德及政府人员以及民团团丁1400余人，并缴获一些武器。这些被俘的团丁有要求参加红军的，经过审查后，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在高台县城，董振堂带头宣传党的政策，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高台县政府，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成立高台县贫民救济委员会，斗争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人民。同时成立了少先队、儿童团和妇救会等群众团体。

1月12日，马步芳部集中四个骑兵团向高台城进攻。董振堂指挥驻守高台城的红五军将士与敌人展开攻坚战。敌人利用大炮、火烧等攻城城外制高点，直逼城下，切断了高台、临泽两地红军的联系，并牵制了沙河堡主力红军，不分昼夜轮番攻城。红军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梭镖、石块等向敌人、砸向敌人。20日凌晨，投降的原民团团丁叛变，打开城门，敌人蜂拥而入，红军将士勇猛拼杀，直至最后一刻，董振堂、杨克明等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

董振堂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十分悲痛。在延安举行的董振堂烈士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情地讲道：“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

1957年，高台烈士陵园建成。园内主要有烈士纪念馆、红五军阵亡将士公墓、董振堂、杨克明烈士纪念馆和战史陈列馆。1965年，又在公墓前建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五军团阵亡烈士公墓纪念碑。董振堂纪念碑亭上镌刻着“宁都豪气千秋在，高台雄风万古传”的楹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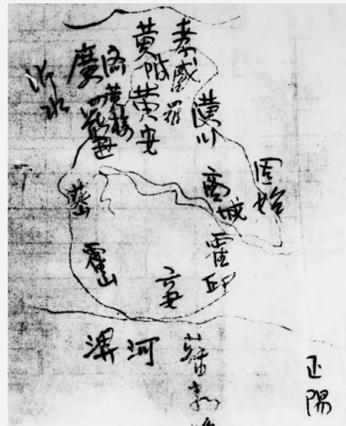
2009年9月，董振堂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董振堂纪念碑。

（据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甘肃日报》）

一张手绘形势图背后的故事



陈赓为鲁迅绘制的地图。（资料图片）

1954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鲁迅遗物时，从一本刊物中发现一张手绘的纸质形势图，上面用铅笔画着一些简图，还标注了安徽、河南、湖北交界的一些地名。这些地方正是当年鄂豫皖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后经陈赓鉴定，这张形势图正是他在上海与鲁迅会面时，亲手绘制的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图。

鲁迅在1932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合义昌煤号经理王君来兜售石炭。这是一句隐语，“王君”正是化名“王庸”的陈赓。时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陈赓在上海养病期间，与鲁迅有过两次秘密会见。

1932年，陈赓在新集西北的胡山寨战斗中右腿受伤。因伤势严重、行动困难，陈赓不得不离开主力部队，前往上海就医治疗。养病期间，陈赓除看报获取信息外，还经常与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们交谈。他们都十分关心苏区的情况，陈赓就结合自身战斗经历讲述鄂豫皖军民在反“围剿”作战中的战斗故事。大家听完后，一致认为应该将鄂豫皖军民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记录下来，如果能有一位知名作家将其写成文学作品传播，其效果不亚于一场大胜仗。陈赓也有同样的想法，“我很希望人民能知道红军和革命群众所经历过的一切，即使将来革命成功了，也永远不要忘记”。

在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付

诸行动。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心向革命的鲁迅。当时在上海工作的鲁迅，正度过自己“战斗”生活中最光辉的10年。在白色恐怖包围下，鲁迅没有屈服，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激烈斗争。因此，鲁迅也拥有了广泛的“红朋友圈”，很多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将其视为志同道合的战友。于是，朱镜我将这些故事记录并油印成册，交给冯雪峰，请他送给鲁迅看。

鲁迅看完这些材料后，深受触动。他听说陈赓还在上海治病，便提出想见见这位“讲故事”的红军将领。在组织的安排下，陈赓欣然赴约。在会见过程中，陈赓为鲁迅详细讲述了红军的英勇作战经历、苏区人民的生活，引起了鲁迅极大的兴趣，两人交谈至深夜才离开。意犹未尽的二人，很快有了第二次会面。陈赓更为详细地为鲁迅介绍了红军作战情况与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为更好地了解鄂豫皖军事形势，鲁迅还特别请陈赓在他的文稿背面画了这幅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图。

两次促膝长谈后，鲁迅便一直在构思一部反映苏区红军题材的小说。遗憾的是，由于精力和创作环境所限，鲁迅最终未能完成这部作品，而陈赓随手画的形势图被鲁迅珍藏起来，成为他与共产党人之间深情厚谊的见证。

（据《中国国防报》）

文人轶事

季羨林晚年的烦恼

季羨林先生晚年一直生活在盛誉和掌声中，“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桂冠被戴在头上，但他对此并不认同。在《病榻杂记》中他写道：“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他又在《大觉明慧茶院品茗录》中说：“近几年来，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片虚名，套在了我的头上，成了一圈光环，给我招惹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这个会长，那个主编，这个顾问，那个理事，纷沓而来，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纸冠，我自己实在无法弄清，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我成了采访的对象，这个电台，那个电视台，这家报纸，那家杂志，又是采访录像，又是电话采访。一遇到什么庆典或什么纪念，我就成了药方中的甘草，万不能缺。还有无穷无尽的会议，个个都自称意义重大，非参加不行……校系两级领导，关心我的健康，在我们门上贴上了谢绝会客的通知。然而知识分子的来访者却熟视无睹，依然想方设法闯进门来。听说北京某大学一位名人，大概遇到了同我一样的遭遇，自己在门上大书：某某死了！但是，死了也不行，他们仍然闯进门来，要向遗体告别……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想找一片人间净土，世外桃源。可每一个并不能都找得到，这不能不是一件憾事。”

（据《联谊报》）

竺可桢写日记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从留学哈佛时就开始写日记，57年从未间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共21卷，其中16卷是日记，共约900万字。

竺可桢的日记内容驳杂，涉及社会文化、气象地质、识才育人、抗战救国、科教兴国等诸多方面，而且记载非常详细，见人见事，成为后世了解当时历史状况的宝贵史料。例如，1936年8月11日，他从南京乘汽车返回浙江大学，一路盯着车上的里程表，测算着南京到杭州距离，连见到多少交通工具都记录下来：“共见自行车七、驴三、运货车六、公共汽车八、小火车十二、包车四。”

每天记载天气、物候情况，是竺可桢日记的“必选动作”。天气如何、温度多少、风向湿度怎样，什么时间桃树开花了、柳树长出绿叶了、燕子从北方飞来了，他在日记中都有记录。作为一名气象学家，这不仅仅是他的日常琐记，也是他研究的数据来源。即使到了临终前一天，他依然用颤抖的手在病床写下最后一篇日记：“局报晴转多云，东风1-2级，最低-7℃，最高-1℃。”此时他已不能到室外亲自观测温度，只好依据气象局的报告作了记录，还特意注上信息来源“局报”两字。

竺可桢日记有着论文般的严谨认真，不论是日记格式还是内容，处处彰显着一丝不苟、求是求真的科学家精神。“求是”是竺可桢为浙江大学订立的校训，“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是他对“求是”二字最精辟的解读。为了完成这种品格砥砺，竺可桢常常在日记里自省、检讨自己。有人写诗称赞竺可桢：

滴水欲穿石，万事需恒持。问天孰能道？求是可为之。

日日家国计，科教救亡时。物候常有变，君心未见移。

每当更换日记本时，竺可桢都会在扉页上抄录古诗词勉励自己。1965年5月7日，他抄录了陆游的七绝《冬夜读书示子聿》；1966年元旦又抄写了岳飞《满江红》中的词句。

《竺可桢日记》被史学界公认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2017年，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竺可桢家人向浙江大学捐赠了竺可桢存世的全部日记原件。

（据《人民政协报》）

一部老旧电话机 见证黄桥决战的峥嵘岁月



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部锈迹斑斑的老旧电话机。这部电话机，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使用过的重要通信工具，见证了陶勇的智慧、英勇与坚韧。

陶勇（1913—1967），原名张道庸，安徽霍邱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扼守黄桥，是1940年10月黄桥决战总体部署的关键一着，也是第三纵队的主要任务。当时，三纵队不足2000人，枪不过1500支，防御兵力明显不足，只能保证重点。根据粟裕“全力打韩”的指示，陶勇结合敌情、地形，机动灵活配置兵力：西边、南边不派部队，由后勤人员担任警戒；北门只放1个班；其余兵力集中在东门一线；同时派出侦察人员到周围各庄了解、掌握敌情。这部电话机，成为陶勇前线指挥战斗的“耳目”与“喉舌”。

1940年10月4日早晨，国民党韩德勤部八十九军4个团和保十旅2个团，在两架飞机的助力下直扑黄桥东门。在激烈的阵地拉锯战中，我双方伤亡较大。5日晨，敌军一部居然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危急时刻，陶勇甩掉上衣，举起指挥刀，率领预备队第三团旋风般杀向东门。5日晚，几天未合眼的陶勇从守备部队中抽出力量，把包括炊事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从东门及其两侧地区打了出去……新四军黄桥决战，第一、第二纵队穿插分割，第三纵队应外合，包围八十九军，战斗进行了5个昼夜，一举歼敌1万余人，八十九军被彻底歼灭。

1980年，陶勇之子张小勇将这部电话机捐赠给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它成为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英勇战斗的历史见证。

（据江苏省泰兴市融媒体中心）